

# 经济增长背景下社会体育文化发展的国民幸福感问题研究 ——基于12座城市(2013—2015)数据的调查分析

黄卓<sup>1</sup>, 周美芳<sup>2</sup>, 郝建平<sup>3</sup>, 刘伟<sup>1</sup>, 孙亚菲<sup>4</sup>, 向玉洁<sup>1</sup>, 童艳<sup>1</sup>, 陈宇<sup>5</sup>, 孟超杰<sup>1</sup>

(1. 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2. 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7;  
3. 江西警察学院体育部, 江西 南昌 330103; 4.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山东 济南 250011;  
5. 江西服装学院体育部, 江西 南昌 330201)

**摘要:** 主要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体育文化发展下的国民幸福感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 1) 通过对6126名有效样本的追踪调查, 发现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国民自感体育文化改变了生活发展方式, 因此, 生活的幸福感在不断呈上升趋势; 2) 对不同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 以及体育群体性事件等因素的被试者进行了幸福感变化的分析, 从中发现各群体结构之间的幸福感受存在着一定差异; 3) 在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对变量因素进行了数据控制分析, 进一步证明了国民幸福感呈上升趋势的可靠性意义。结论: 经济增长和体育文化物质生活的改善从整体上提高了国民的幸福水平, 但是, 当今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放缓, 现有的体育文化发展模式不再维持现状时, 国民的幸福感受要持续稳定的发展, 就必须改变政府的工作管理思路, 这也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研究的目的是回应有关中国公民幸福感的争论, 探索体育文化政策对国民幸福感的变化作用。

**关键词:** 体育文化; 幸福感; 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 中国公民;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G80-0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12(2017)02-0017-07

## National Happiness Brought by Social Sports Cultur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2 Cities Data (2013-2015)

HUANG Zhuo<sup>1</sup>, ZHOU Mei-fang<sup>2</sup>, HAO Jian-ping<sup>3</sup>, LIU Wei<sup>1</sup>, SUN Ya-fei<sup>4</sup>, XIANG Yu-jie<sup>1</sup>,  
TONG Yan<sup>1</sup>, CHEN Yu<sup>5</sup>, MENG Chao-jie<sup>1</sup>

( 1. College of P. E., Qianhu Campus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China;  
2. College of P. E., Yaohu Campus of Ji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 Jiangxi China;  
3. College of P. E., Jiangxi Police College, Nanchang 330103, Jiangxi China;  
4. The Affiliated High Schoo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1, Shandong China;  
5. P. E. Department of 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Nanchang 330201,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national happiness brought by social sports cultur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Results: 1) The investigation on 6126 effective samples showed that more than half citizens felt that sports culture changed mode, and life happiness rose. 2) The change of happiness was analyzed on different gender, age, place of domicile, educational level, occupation, family income and sports social group ev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appiness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ructure people. 3)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happiness was further proved by analyzing the variable factors based 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life of sports culture improve the national happiness level. When the future macroeconomic slows down and the existing spo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no longer maintains, the work way of governments should be changed to continu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appiness, which is an important work task of our society. Also this study aimed at responding to the debate about the happiness of Chinese

投稿日期: 2016-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13BTY015)。

作者简介: 黄卓,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

citizens , and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sports culture policy on national happiness.

**Keywords:** sports culture , happiness , economic growth , social development , Chinese , urbanization

社会经济增长带动了城市发展的加快,市民为此会感到更幸福吗?在现实中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了 40 多年,且很难判定的问题,西方学者在 1973 年就曾提出:贫穷国家的公民是否幸福感要低于富裕国家?收入提高了就会增加个人的幸福感吗?研究的结论是,在个体范围内,通常是经济收入影响幸福感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公民都能提高,也不是对所有国家都一致<sup>[1]</sup>。这说明了幸福与收入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关系,称之为“幸福悖论”<sup>[2]</sup>;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还提出了“绝对幸福理论”的概念,认为不存在相对及变动的幸福标准,“人的基本要求是幸福感受的基础,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固有的情感”<sup>[3]</sup>。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体育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加大了体育文化民生建设的步伐,提出了大力推进体育服务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结构升级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十二五”期间计划的目标<sup>[4]</sup>。由此可见,这些年来在国家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民生效应问题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为国民幸福感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的社会问题也逐渐产生。如体育公平等一系列公共体育服务配置不均问题就是突出的社会矛盾,使得一部分人“不幸福”的内心感受由此产生,引起了政府与公众的关注;所以说,“幸福”与“不幸福”是一个相对矛盾体。如何理解这个具有冲突的信息,这也是本研究探索的目的,对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纵观这些年来幸福感问题在体育领域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整体上研究的理论视野还比较局限,但成果至少可以说为后续的深入分析提供了基础。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有关幸福感时间跨度追踪变化情况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至今还很少有发现,研究也未能采用多元分析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课题的要求,在研究范围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们选择了南昌市、九江市、赣州市、湘潭市、杭州市、台州市、丽水市、福州市、泉州市、永安市、济南市、淄博市的社区居民为主要调查对象,在 2013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期间,对上述 12 个城市的 43 个社区 8 152 名研究对象进行了追踪调查,连续 5

个时间点都进行了测查且为有效样本的人数为 6 126 人,占总数的 75.15%,其中男性有 4 219 人,占 68.87%,女性有 1 907 人,占 31.13%。值得提出的是,尽管样本偏少且男女分布不均,不能代表全国性意义,但可以作为本课题的阶段性参考内容。本研究也是对事物的初步了解,是工作条件限制下的尝试。

###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CNKI)以“幸福感”“幸福指数”“体育文化”“体育发展方式”或“运动员”等为关键词,检索了 2016 年 6 月以前的“CSSCI 来源期刊”相关文献 9 篇,直接引用的论文有 2 篇。另外,在江西省图书馆、南昌大学图书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对有关“幸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利用工作方便之处,联系了在国外留学的人士和外国专家,请他们帮忙收集整理了大量英文资料,目的是为本研究扩大学术视野,提供理论支持。

### 1.2.2 调查法

1.2.2.1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课题的“城市体育文化发展问题”为主导思想展开,列出了大量的问卷题,再从研究的主题出发,统筹兼顾,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讨论下筛选出了 54 题为问卷调查表的主要内容,其中突出强调“幸福感”的问卷题是,“当今社会体育文化的现状,它对目前您的生活影响是”,答案分别为“非常幸福”“幸福”“还可以”“不幸福”“非常不幸福”共计 5 个。按照幸福感问卷理论的要求,课题组成员在其中 1 次本研究(放在第 3 个时点)的测量中将题目有所改动,但不失去原本意义,即“当今社会体育文化的现状,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觉快乐吗?”答案分别为“很快乐”“快乐”“一般”“不快乐”和“很不快乐”对应的 5 个。本次问卷考虑到“幸福”(happiness)与“快乐”(happy)基本上是一个定义,所以,根据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指向进行了问卷的整体设计。在测查结果的答案上再分别赋值,即 5 分——非常幸福(或很快乐)、4 分——幸福(或快乐)、3 分——还可以(或一般)、2 分——不幸福(或不快乐)、1 分——非常不幸福(或很不快乐)。本问卷根据追踪调查要求,为了便于工作,特选择了 2013 年(夏)暑假、2014 年(春)寒假、2014 年(夏)暑假、2015 年(春)寒假和 2015 年(夏)暑假,共分为时间阶段的 5 个时点调查测试,这为比较 2 年来公民幸福感变化分析提供了条件。由于测查工作量极大,因此没有做每次测查结果的效度检验,这也是能力有限和时间约束所造成的结果。

1.2.2.2 个人访谈法 根据问卷内容的需要,特地在每次测查的访谈提纲中设置了“幸福感”问题的访谈

内容,提问方式灵活多样,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城市变化、体育文化服务要求、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等对主观幸福感提高的具体情况、理由及愿望而展开咨询,访谈目的是对“幸福感”的深入了解与剖析,并将每次访谈结果记录在册,且每日整理归类,为分析问题做支撑作用。

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tata 统计软件对所测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本研究所需内容。

##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概况分析 在“城市体育文化发展问题”的问卷调查中,2013—2015年共计5个时段的时间里,就调查主题为背景,有1007人占16.4%的公民感觉过(至少回答过1次,下同)生活过的“非常幸福”(或“很快乐”),有1826人,占29.8%的公民感觉过生活的“幸福”(或“快乐”),这2项积极的因素加起来占样本总数的46.2%;有3311人,占54.1%的公民感觉过生活过的“还可以”(或“一般”),另外还有682人,占11.1%的公民自感生活在这座城市,社会体育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幸福的感受,因此回答“不幸福”(或“不快乐”)或“非常不幸福”(或“很不快乐”)(图1)。从分值情况看,2013—2015年被调查的居民生活幸福感受平均值为3.48(满分为5分)。从整体印象上可以认为,有接近一半的公民认为改革开放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实惠,体育文化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丰富了自己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公民应该要感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已经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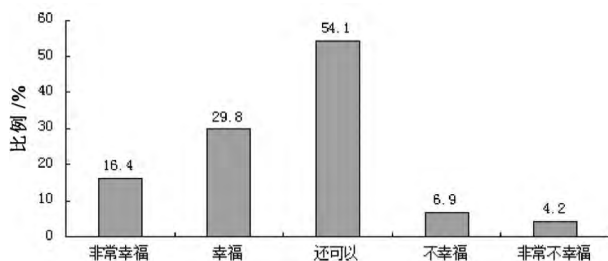


图1 被试者幸福感总体情况分布(2013—2015年)  
Figure 1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Happiness (2013 - 2015)

2.2 各群体结构分析 从本研究幸福感的整体情况来看,尽管以上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样本的幸福感受,但是各群体之间具体的差异并没有反映出来。为此,根据研究的需要,将“非常幸福”与“幸福”合并成为“幸福群体”,再根据《问卷调查表》中第1部分,既“基本信息”中的性别、年龄、户籍、收入、婚姻状况、学历、职业和健康状况等社会因素条件,以此比较各群体之间的幸福感受差异,进一步反映2年来5个时段城市居民主要群体幸福感的变化情况(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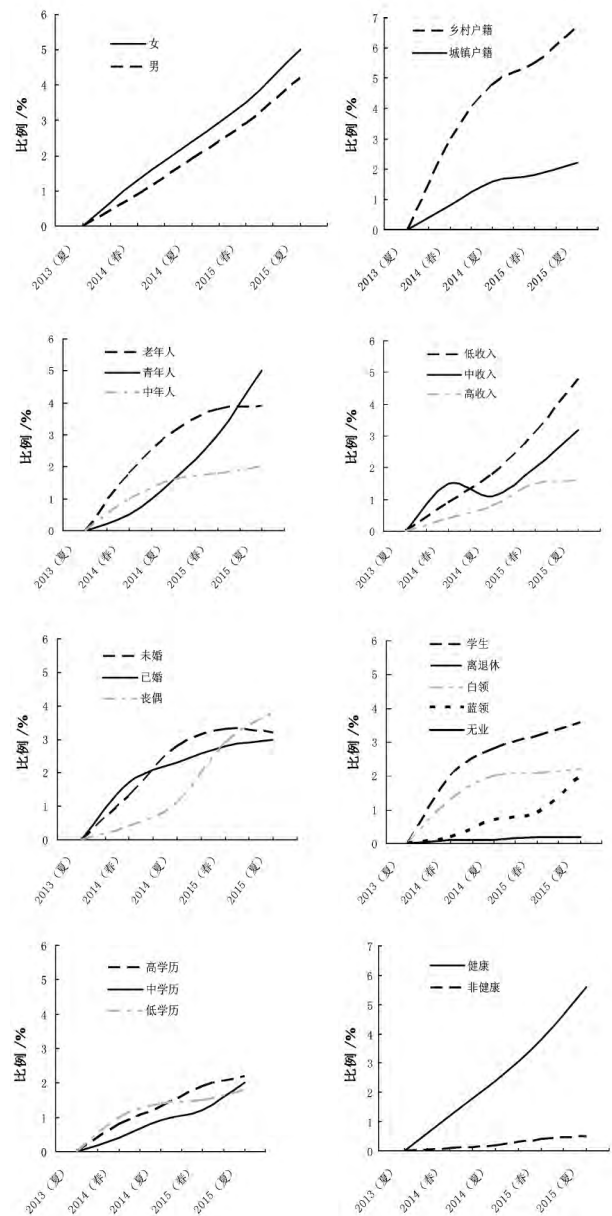


图2 8个问题各群体指标幸福感2年来变化趋势  
Figure 2 Two Years Changes of 8 Problems About Happiness

以2013年(夏)各群体幸福感均值为基准点,到2015年(夏),男、女自感城市体育文化带来幸福感提升的群体分别增长了3.9%和5.4%,说明在国家经济整体实力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体育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女性认识提高的幅度要大于男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大量移民城市,成为了城市中的新市民;因此,本研究问卷中提出原户籍所在地的调查,发现原农村户籍的被试者与城镇户籍者自感幸福分别增长了6.7%和2.4%,反映出了来自城乡公民对幸福感的各自认识。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户籍管理在各省之间,甚至各城市之间也不相同,在研究中某些方面可能不够统一,特别是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户籍关系比较复杂,显然这不能代表样本实质

性意义。为此,本研究根据以往调查经验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基本认为其结果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所计算的数据也是符合人口学科学理论要求的。

在年龄分析的问题中,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分为青年人(30岁以内)、中年人(31~55岁)、老年人(56岁以上),发现3种群体2年来对幸福感的认识分别提高了3.7%、1.9%和4.9%。在访谈中也发现,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感幸福提高的较快,中年人反映比较平稳,青年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自感幸福提高较快;但在中年人当中,女性比男性自感幸福的人群提高较快,男女差异显著( $P < 0.05$ )。在收入分析上,本研究的问卷题为“您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约\_\_\_\_万元”。在统计中,参考国际收入标准(美元)分类,本研究自定为人均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为低收入家庭,5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家庭,10万元以上为高收入家庭。统计数据显示,自感幸福提高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3组数据分别为4.8%、3.2%、1.6%,检验结果( $P < 0.05$ )反映出并不因为家庭收入富裕者自感幸福的人较多。在访谈中也了解到,所谓的低收入家庭主要为新组建的年轻人,他们尽管收入不高,但体育文化是“潇洒”生活的主题,所以自感幸福的比例提高较快。中等收入的群体许多都是普通工薪阶层和中老年人家庭,生活节俭,因为生活中大项目开支太多,如:子女教育、买房、买车、医疗费用等,所以不敢“潇洒”已成为了习惯,这在内地城市表现的比较突出,如:赣州市、湘潭市等。高收入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忙于生意,没有时间去分享体育文化的“快乐与潇洒”,在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沿海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表现的较明显。另外,由于家庭、文化等多方面约束,体育文化所带给他们的幸福感认识似乎感觉离自己比较遥远。

根据被测试者对婚姻状况的回答,3个变量选择即未婚、已婚、丧偶(或离异)对幸福感的认识分别增长了3.3%、3.1%、3.8%,说明了婚姻状况对自感幸福影响差异不大( $P > 0.05$ )。访谈中也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幸福的追求,这与婚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太大关系。在职业分类问题上,本研究将其划分成白领、蓝领、学生、离退休、无业4个成份属性,被测试者自感幸福分别增加了2.4%、2.0%、2.8%、2.7%、0.3%,检验结果( $P < 0.05$ )。本研究在访谈时掌握到大学生对社会变化十分敏感,对体育文化娱乐的幸福有着比较浓厚的追求愿望,离退休群体由于时间比较充裕,自己掌握时间的机会比较多,他们普遍反映电视等媒体宣传“全民健身”的方法手段内容丰富,所以锻炼身体、追求健康、延年益寿是这些老年人心中最大的愿望,他们普遍关心社区的体育文

化娱乐设施建设,甚至通过建议的形式发展社区体育文化,有人认为这也是他们事业的第2次“贡献”。对于其他研究群体,被访谈者普遍反映,对体育文化娱乐“比较关心”,但时间条件不允许,现在其他事情太多了,顾不及体育文化娱乐,但必须肯定体育文化娱乐是个“好东西”。

关于学历结构问题,本研究主要想考察文化水准是否会对体育文化娱乐幸福感提高有影响。研究分为低学历(中学、中专以下)、中等学历(专科、本科)、高学历(硕士以上)3种学历人群2年来对自感幸福分别增长了1.8%、2.1%、2.3%,检验结果( $P > 0.05$ )。本研究了解到,低学历者现在主要集中在离退休群体和个体生意者群体之中,由于历史等原因造成了他们知识学习机会比较少,但他们对体育文化娱乐带来自感幸福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现在所谓的高学历群体“很会玩”,知识带给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在本研究所调查的大城市中,这部分占的人数比例比较高。中等学历的人年龄普遍都在中年人(31~55岁)之间,他们对体育文化娱乐的发展一般都是持肯定态度,也有许多人深感体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发展方式。

从健康状况来谈论体育文化娱乐发展的主题,身体健康的人群对自感幸福提高的较多,达5.9%,而身体不健康(包括长年体弱多病,残疾等)提高的较少,达0.7%。本研究在访谈中了解到,人人都十分关心健康,深刻认识到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更谈不上幸福感。国家经济在发展,老百姓收入也在提高,城市发展把体育文化作为重要内容列入了发展规划之中,许多被访者都认为,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现实反映,是自信的增强,体育文化娱乐也是调节生活情趣的内容之一。有残疾人士还反映,社会体育文化娱乐过多的注重了健康人的需求,对残疾人考虑不周,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残疾人参与其中还有被社会嘲笑的可能,媒体对残疾人只宣传残奥会上的辉煌,在现实社会层面上关心的还不够,这就是体育的“不公平”,社会提倡的公共体育服务还有待改进与提高的过程。这充分表达了身体弱者的深层次呐喊。

从图2每个群体的幸福感结构发展趋势来分析,公民对幸福的感受程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也说明了2年来被调查人群的自感幸福总体在上升,应该更确切地说,虽然只有2年较短的时间间隔,但是这种发展趋势还是很快的,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与中国综合社会化调查(CGSS)的国际公布,在“中国公民幸福感”变化趋势上基本一致。为了方便统一,本图2均以2013年(夏)“零”为起点。

在对上述群体幸福感变化趋势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后,本研究可以初步提出,在2013—2015年中,被测

试者 5 个时点的整体幸福感呈上升趋势,这与国家经济增长,城市发展以及体育文化普及提高有密切关系。当然,调查结果与访谈情况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有相当一部分被测查者感到自己的幸福感只是“还可以”,尽管属于积极因素范畴,但心理也许还有些其他的想法存在;另外,关于残疾人自感幸福的提高问题等,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2.3 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sup>[5]</sup> 将本研究归纳为 2 个方向的研究思路,1 是确定以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学历、婚姻和城乡户籍等 7 个变量因素为幸福感的观察条件;2 是将幸福感置于 2 个维度的比较框架之中,即 横比:与他人之比,观察自己的位置;纵比:与自己以往比,幸福感是否有提高。本研究采用回归模型方法,观察幸福感在不同时点的变化情况。

表 1 回归模型中幸福感变化情况统计  
Table 1 Happiness Change in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总样本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	
幸福感	6 126	3.522	1	5	1-5 分序列变量	
幸福感	不幸福	(参照组)				
	幸福(还可以)	5 716	0.666	0	1	虚拟变量 1 = 幸福
	2013 年(夏)	6 126	(参照组)			
	2014 年(春)	6 126	0.612	0	1	虚拟变量 1 = 2014(春)
	2014 年(夏)	6 126	0.626	0	1	虚拟变量 1 = 2014(夏)
	2015 年(春)	6 126	0.641	0	1	虚拟变量 1 = 2015(春)
	2015 年(夏)	(5 837)	0.652	0	1	虚拟变量 1 = 2015(夏)
性别	男	(参照组)				
	女	1 907	0.672	0	1	虚拟变量 1 = 女性
年龄/岁	18 以下	(参照组)				
	18 ~ 30	506	0.515	0	1	虚拟变量 1 = 18 ~ 30(岁)
	31 ~ 40	617	0.526	0	1	虚拟变量 1 = 31 ~ 40(岁)
	41 ~ 50	1 343	0.527	0	1	虚拟变量 1 = 41 ~ 50(岁)
	51 ~ 60	1 015	0.631	0	1	虚拟变量 1 = 51 ~ 60(岁)
	61 ~ 70	1 882	0.609	0	1	虚拟变量 1 = 61 ~ 70(岁)
	71 以上	669	0.584	0	1	虚拟变量 1 = 70 岁以上
婚姻	未婚	(参照组)				
	已婚	3 175	0.832	0	1	虚拟变量 1 = 已婚
	丧偶或离异	609	0.067	0	1	虚拟变量 1 = 丧偶或离异
户籍	乡村	(参照组)				
	城镇	5 856	0.612	0	1	虚拟变量 1 = 城镇户籍
教育		6 029	7.5	0	22	连续变量,受教育年限数
家庭人均年收入		6 114	6.457	0	10	连续变量,最高 10 万元/年
现在主观社会地位		5 881	2.261	1	5	1-5 分序变量
与以前相比 社会地位变化		5 938	2.405	1	3	1-3 分序变量

注:1. 幸福按 2 分法换算,即幸福(还可以)为“1”,不幸福为“0”。  
2. 学历由于历史原因不统一,因此按问卷中受教育年限来统计。  
3. 家庭收入受市场经济影响变化较大,所以按所测量内容来统一,高于年收入 10 万元者一律按 10 万元计入。  
4. 主观社会地位及变化情况均按照问卷中自我感觉选择而定,是职业选择相关内容之一。  
5. 2015 年夏(第 5 时点)调查后,本研究对样本个别有疑虑之处进行了修正。

根据表 1 中回归模型的变量,本研究在因变量上为 OLS 回归模型固定了幸福感(1 ~ 5) 测量变量值,这

同时也是为 Logistic 模型提供了实现幸福感(1 ~ 0) 测量的虚拟变量值。在自变量上,除了家庭人均收入等一系列变量因素外,还进行了纵横变量比较。

表 2 是在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因变量与自变量 2 个方面所做的进一步分析,本研究运用了 6 个 OLS 回归模型进行表述。其中幸福感的因变量将取 1 ~ 5 的变化值。在模型 1 中,本研究将 2014 年(春) — 2015 年(夏) 的 4 个时点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并从中所对应的各项幸福感均值明显地显示出了每个时点的变化情况。以 2013 年(夏) 第 1 个时点为参照,表 2 中的 4 个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各时点的被试者幸福感分值是上升趋势,即幸福感在提升。模型中的常数为对应的参照组所产生幸福感的均值,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显示与图 2 所示曲线整体上是

表 2 被试者幸福感 OLS 回归系数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OL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Subjects' Happines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时间(年度)	2013 年(夏)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2014 年(春)	0.235▲	0.297▲	0.298▲	0.272▲	0.187▲▲ (参照)
	2014 年(夏)	0.262▲	0.332▲	0.325▲	0.290▲	0.362▲▲ 0.258▲▲
	2015 年(春)	0.531▲	0.576▲	0.565▲	0.534▲	0.421▲ 0.337▲▲
	2015 年(夏)	0.596▲	0.665▲	0.645▲	0.573▲▲	0.577▲ 0.567▲▲
性别	男	参照组				
	女		0.53▲▲	0.091▲▲	0.098▲▲	0.078▲▲ 0.061▲▲
年龄/岁	18 以下	参照组				
	18 ~ 30		-0.201▲	-0.271▲	-0.199▲	-0.237▲ -0.218▲
	31 ~ 40		-0.395▲	-0.342▲	-0.312▲	-0.237▲ -0.262▲
	41 ~ 50		-0.364▲	-0.247▲	-0.258▲	-0.112▲ -0.107▲
	51 ~ 60		-0.179▲	-0.105▲	-0.119▲	-0.037▲ -0.011
	61 ~ 70		-0.285▲	-0.316	-0.205	0.231 0.241▲
	70 以上		-0.096	0.254▲	0.261▲	0.279▲ 0.251
婚姻	未婚	参照组				
	已婚		0.210▲	0.321▲	0.231▲	0.315▲ 0.301▲
	丧偶或离异		-0.301▲	-0.254▲	-0.274▲	-0.107▲ -0.109▲
户籍	乡村	参照组				
	城镇		0.201▲▲	-0.103▲▲	-0.107▲▲	0.037▲▲ 0.031▲
教育			0.041▲	0.033▲	0.023▲	0.026▲
家庭人均年收入				0.051▲▲	0.027▲▲	0.032▲▲
现在主观社会地位					0.317▲	0.311▲
与以前相比 社会地位变化					0.203▲	0.216▲
N	常数	3.364▲	3.201▲	2.912▲	2.873▲▲	2.011▲▲ 2.098▲
样本	6 126	7 358	6 726	6 166	6 837	6 126
R <sup>2</sup>	0.051	0.092	0.089	0.109	0.312	0.191

注:“▲”为 P < 0.05,“▲▲”为 P < 0.01(双尾)。以下各表同。

在性别及年龄模型变化中,各时点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有增长的趋势。在模型 2 中显示,控制这 2 个

因素的变量后,各时点的幸福感变化也将突现。显示出了群体间其他变量的信息关系。虽然,在引进教育变量之前,户籍关系的变量系数均为正值,意味着城镇居民对生活周边体育文化娱乐环境的改善所产生的幸福感要高于乡村居民,但是在引入教育资源人口变化后,现实也表明大量的农村户籍人口涌入城镇,成为了城镇人口的新移民,这时城镇户籍变量有可能会形成负数,这也就是解释了来自农村户籍的人口对城市现有的体育文化条件更容易得到满足的基本原因之一。本研究还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对家庭收入等其他变量因素也做了相应的分析,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只不过是教育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要更为显著些。如:已婚者比丧偶(或离异)者要更幸福些,青年人和老年人要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幸福感更高一些,中间年龄段的人显得稍差些,因此形成“U”型曲线,等。如何解释这些实际现象呢?理论上认为,在控制某项因素(如教育)之前,某一变量(如城镇户籍人口)的正值影响了由于教育差异所带来的认识影响上的不同;因为受教育相对较多的人对体育文化所产生的幸福感要敏感些、快些,即教育水平与体育文化幸福感体验呈正相关;另外,同样受教育影响者,乡村户籍人口幸福感高于城镇户籍的现实原因,可能就是满足感更容易实现,这是生活环境差异所造成的<sup>[6]</sup>;但是,当本研究如果控制横比变量时,城镇户籍人口变量则成正值。

当模型 4 引入家庭收入后,各时点的变量呈增长的趋势。本研究由于条件所限,暂时不考虑地区收入的差异,以及市场价格上涨因素,事实上在本研究的 5 个时点共计 2 年时间内,价格上涨幅度也是有限的。为此,家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应该是存在的,从表 2 回归系数的表面分析也可以看出有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幸福感变化也许有其他的原因在支撑,现实中这部分群体对城市体育文化条件的变化反映要多一些,因而幸福感更为强烈。当本研究引入模型 5,即产生横比和纵比之后,在 2 个自变量的不同时间虚拟变量系数随即产生增长的趋势。这 2 个变量实际上对幸福感的变化是有一定预测力的,从而产生  $R^2$  从 0.109 上升到 0.312。如果结合模型 4,当这 2 个变量值参与其中,就明显地看出幸福感在此存在 9.9% 的差异。也就是说,纵横 2 个变量比对自感幸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地位的变化,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下,对幸福感的提升将产生正相关的影响力。这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也基本上是一致的<sup>[7]</sup>。另外,针对本研究样本及时间跨度的局限性,本文为此增加了模型 6 的回归分析,实际上该模型也是对 2014(春)、2014 年(夏)、2015 年

(春)、2015 年(夏)这 4 个时点的数据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其变化规律基本是相同的,这一点初步证明其他模型建立是可靠的。

在图 1、图 2 的分析中,本研究主要采用频率和百分数来表示公民幸福感的数量变化,即自感幸福的公民人数只是反映了各群体的总数在增加。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结论的成立,最为合适的回归模型应当选择 Logistic 回归。据此,还是沿用虚拟变量的方法来做因变量,即 1 = 非常幸福、幸福和还可以,0 = 非常不幸福、不幸福。因此,表 3 中的结果与表 2 基本一致或相似。从表 3 中模型 5 也可看到,如果其他变量都一定不变时,与其他时点变量有关的比率值则增大。本研究所测查的样本数其 odds(概率)在 2014 年(春)是 2013 年(夏)的 1.463 倍,同理在 2014 年(夏)、2015 年(春)和 2015 年(夏)这 3 个时点上幸福感概率比率分别是 1.924, 2.644 和 6.601 倍。即使排除 2013 年(夏)时点的调查,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 6 以 2015(夏)时点的调查结果时为点。2015(夏)的幸福 odds 依旧可以维持在 4.598 倍的较高水平上,这些数据变化可以证明公民的幸福是在呈稳定的递增趋势。

表 3 被试者幸福感因素 Logistic 回归比率分析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of Happines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时间(年度)	2013 年(夏)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参照组	排除该年
	2014 年(春)	1.482▲	1.587▲	1.738▲	1.495▲	1.463▲ (参照)
	2014 年(夏)	1.523▲	1.556▲	1.557▲	1.620▲	1.924▲ 1.509▲
2015 年(春)	2.764▲	3.129▲	3.326▲	3.231▲	2.644▲	1.836▲
2015 年(夏)	4.536▲	5.407▲	5.325▲	4.259▲	6.601▲	4.598▲
性别	男	参照组				
	女		1.087▲	1.184▲	1.254▲	1.281▲ 1.254▲
年龄/岁	18 以下					
	18~30		0.740▲▲	0.792▲▲	0.761▲▲	0.820▲▲ 0.839▲▲
	31~40		0.656▲▲	0.731▲▲	0.714▲▲	0.705▲▲ 0.788▲▲
	41~50		0.683▲▲	0.848▲▲	0.834▲▲	0.822▲▲ 0.792▲▲
	51~60		0.736▲▲	0.979▲▲	0.964	0.856 0.981
	61~70		0.897▲▲	10.32	1.395	1.167 1.523
	71 以上		0.902▲	1.485▲▲	1.420▲	1.396▲▲ 1.586▲▲
婚姻	未婚	参照组				
	已婚		1.633▲▲	1.737▲▲	1.763▲▲	1.937▲▲ 1.824▲▲
	丧偶或离异		0.773▲▲	1.847▲▲	1.859▲▲	0.917 0.972
户籍	乡村	参照组				
	城镇		1.348▲▲	0.967▲	0.983▲	1.172▲ 1.143
教育				1.186▲▲	1.163▲▲	1.151▲▲ 1.159▲▲
家庭人均收入					1.277▲▲	1.184▲▲ 1.173▲▲
现在主观社会地位						1.887▲▲ 1.858▲▲
与以前相比 社会地位变化						1.817▲▲ 1.732▲▲
N		6 126	7 358	6 726	6 166	6 837 6 126

### 3 结 论

关于国民幸福感的描述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界谈论的话题,也是国情调研的内容之一。理论与现实都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建设面貌焕然一新,体育文化民生建设得到较大的改观,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幸福感,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社会发展中由于一些微观的问题,正在或有可能抵消社会的努力<sup>[8]</sup>。

这些年来,我国的体育文化事业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促进了体育文化基础设施的改善,为繁荣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sup>[9-10]</sup>;但是,也要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今后中国GDP不可能长久保持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水平线上,政府对城市体育文化建设的硬件设施投入也不可能继续大包大揽地发展下去。现在许多地方的公益性体育文化设施建设趋于相对的“饱和”态势<sup>[11-12]</sup>,公民的幸福感是否因为这种“饱和”的出现而继续提升?也即假如经济不再高速增长,政府体育投资有限,公民的幸福感是否还会持续提升稳定的提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问题<sup>[13]</sup>!国外有人把这种情况比作“自行车运动”,既只有维持相当的速度,稳定才有可能,如果速度减缓,车身就会倒下。以目前发展形势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了现实;因此,本研究的深刻感受是,经济增长带动了社会一系列的发展,包括与公民生活质量提高有密切关系的体育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依次递进,经济增长是提高公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那么相反,如果经济收缩,幸福感又会出现怎样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政府要重视民生效应的提高,幸福感和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是政府最大的政绩工程,要持续性提高公民的幸福感,建议要在体育文化前期硬件设施稳定的基础条件下,扩大私人企业对硬件设施特别是公益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资建设,并同时发展体育文化事业进行管理上提高,促进群体性事件正能量的开展,使公民深深地能够感受到幸福的生活天天在变化,以此不断地提高公民的自我幸福感受能力。

贡献与不足:本研究只是通过一些客观的指标去分析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受,当然这也是一项严谨细致并富有挑战的工作,在测查工作中,也发现人的主观感受变化万千,单独只是用简单的问卷方式来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变化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包括影响公民幸福感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人际关系、历史背景因素以及生理、心理等许多变量因素都无法获得,因此,本研究的成果显得价值与意义还比较单薄,这也是我们的能力所限;所以,本研究的结论是持审慎、开放的态度所进行的初探,以期得到学者们的推进与更有说服力的成果出现。

###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A.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C]//P. A. David and W. R. Melv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M]. New York: Academician Press, Inc., 1974: 89-125.
- [2] Simon Appleton.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 2325-2341.
- [3] Run Veenhoven. Is Happiness Relativ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1(24): 1-35.
- [4] 中国体育年鉴(2016) 编辑组. 刘鹏在2015年全国群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M]. 北京: 中国体育年鉴社, 2016: 14-17.
- [5] Di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0(55): 34-43.
- [6] 王庆勇, 布特. 幸福体育的哲学考量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3): 14-21.
- [7] 王鹏.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3): 12-24.
- [8] 陆俊杰. 居民社会体育权利保障政府责任: 基于“广场舞扰民”的思考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7(11): 30-35.
- [9] 唐明.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6, 35(1): 135-139.
- [10] 邓志红, 黄晓春. 体育文化的多源机制及其意义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3, 32(2): 46-50.
- [11] 史友宽. 论体育文化多元共享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 36(4): 39-43.
- [12] 李春晖. 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特性与体育人文精神建设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12): 22-26.
- [13]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 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2): 82-102.